东汉《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彭丰文

[摘要]东汉《白狼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鲜活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还体现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边疆开发、西南夷政治心理成长演变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关键词]《白狼歌》; 西南夷; 大一统; 政治认同; 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 C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7)05—0047—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81

《白狼歌》是东汉时期以白狼夷为首的西南夷各族用夷语创作、传唱的一首歌谣，叙述了白狼、槃木、唐菆等族的夷人首领率领族人历尽艰险、赴东汉京城洛阳朝贡的经历和感受。据《东观汉记》、《后汉书》等史书的记载，《白狼歌》共分为三章，歌谣原来分别被命名为《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由于东汉益州刺史朱辅的努力，《白狼歌》由通晓夷语的汉吏田恭译为汉文，呈献给东汉朝廷，获得汉明帝的关注和嘉许，录入史书，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边疆民族歌谣文本。由于《白狼歌》既有汉译文本，又保留了以汉语记音的“夷人本语”，是一份接近原汁原味的汉代西南夷活动的历史档案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民族语言学价值，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一直以来，学界对《白狼歌》的民族语言学价值非常重视，王静如先生、黄振华先生、方国瑜先生等学界前辈和陈宗祥、马学良、郑张、黄懿陆、吴安其、杨照辉等学者著书立说，① 见仁见智，从民族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将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资料与《白狼歌》夷语进行对照研究，由此探讨白狼语的语系分类、语言发展脉络和白狼夷的族属、地望及其与现代少数民族的族源关系等问题，推动了《白狼歌》研究的不断发展。然而，《白狼歌》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专门性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有的论著对此虽然有所涉及，也仅是略述一二，未及深入。鉴于这种研究状况，本文尝试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充分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在汉代特定历史背景中对《白狼歌》展开新的探讨，对《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对其历史价值作出客观评价。一孔之见，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校正。

一、关于《白狼歌》汉译文本可信度探讨

保留在史书中的《白狼歌》有夷汉双语两种文本，夷语文本实为汉语记音而非夷语书面文字，汉文文本则是夷语的对译。千百年来，《白狼歌》的汉译文本在后世被广为接受和认可，其可信度受到普遍肯定。但是近年来，也有学界前贤从民族语言学的研究角度，对《白狼歌》汉译文本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认为汉译文本可能并没有忠实于夷语原文，夷语原文其实是诉说统治者的无知和贪婪，山地民族生活的艰难，而不是对朝廷的歌颂;[1]或者认为白狼语的文本中隐藏了白狼王对歌颂汉统治者的不满。[2]《白狼歌》汉译文本是否忠实于夷语原文，是否具有基本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对《白狼歌》政治文化内涵的阐释，进而关系到对《白狼歌》历史价值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再次讨论。在此，笔者打算从历史学的角度，在汉代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侧重从《白狼歌》的产生、流传

等各个细节来探讨和评估其汉译文本的可信度。

《白狼歌》最早记载于《东观汉记》[②],后被《后汉书》采用,从而流传后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化。'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繦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李贤注曰:《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3](P.2855)

由此可知,《白狼歌》之产生,乃是由于汉明帝在位时期,益州刺史朱辅镇抚有方,白狼、槃木、唐菆等汶山以西"远夷"约六百万人归附东汉王朝,白狼王及其他部族首领率领族人翻山越岭,远赴京城洛阳朝贡,途中白狼王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然"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朱辅得知后,命通晓"夷语"的犍为郡掾田恭翻译成汉语,又令田恭与从事史李陵将白狼王等归附东汉的夷人首领及其族人护送至洛阳,将诗篇郑重其事地献给东汉朝廷。与此同时,朱辅向汉明帝呈送上疏,详细汇报此事。远夷朝贡并有颂诗呈献,对中原王朝来说是一桩盛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汉明帝对此极为嘉许,命史官记入史册,即《东观汉记》。根据唐代李贤对《后汉书》的注解可知,《东观汉记》详尽记录了该诗篇的汉语译文和"夷人本语"全文,是一份夷汉"双语"互译文本材料,其中"夷人本语"是汉语记音的记录,汉语译文则是对夷语的对照翻译,而《后汉书》记述此事的史料就是来源于《东观汉记》。作为一部官方性质的东汉王朝"国史",《东观汉记》在记录本朝重要历史事件时应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严谨性和权威性。在《后汉书》成书并广泛流传之前,《东观汉记》一直是人们了解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由上可见,《后汉书》这段引自《东观汉记》的材料,对《白狼歌》的来源与流传轨迹作了清晰的介绍,对其流传的各个关键环节如诗篇的创作缘起和翻译人员官职、姓名等内容作了详细交代,其信息脉络清晰,环环相扣,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特别是《东观汉记》的史官在记录汉译文本的同时,以双语对照、汉语记音的形式保留了《白狼歌》的夷语原文,应是为了尽可能地保留历史信息,为白狼夷等西南夷各族诚心归附、远来朝贡的史实增加切实可靠的佐证材料,增加历史记录可信度。在《白狼歌》保留了夷汉"双语"互译文本的基础上,考虑到东汉皇权的权威性,涉及此事的各级官吏出于对皇权的敬畏,既无胆量也无必要在翻译文字内容上造假。特别是如果《白狼歌》的"夷人本语"中有直接或间接批评汉王朝统治者的内容的话,翻译者应不敢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生命危险,将"夷人本语"的文本随同汉译文本一起呈送给东汉朝廷。

总之,由于《白狼歌》有明确清晰的的产生、流传路径,有夷、汉各族统治者和民众的共同参与,并庄严郑重地公之于朝堂,载之于史册,笔者认为不论其夷语文本还是汉译文本都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白狼歌》既是白狼夷等西南夷较为接近真实的政治心理的体现,又是汉王朝统治者及各级官吏政治心理的基本反映,歌谣所叙述的史实及其所表达的情感基本可信,对于研究汉代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当时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特点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宝贵的历史价值。

不过,在认可《白狼歌》汉译文本内容基本可信的前提下,也不排除田恭在将"夷人本语"译为汉文的过程中,对歌谣文字进行适当的修饰润色,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汉人的政治观念以及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因此在以《白狼歌》及其相关史料探讨汉代西南夷政治心理等问题时,仍要注意对这些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与甄别,而不是简单盲目地引用。

二、《白狼歌》与汉代西南夷的政治认同

《白狼歌》虽是一首以白狼夷的族名来命名的歌谣,然而这个名称乃是在后世流传中约定俗成的称呼,并非呈献给东汉朝廷之时的初始之名。如前所述,当时呈献给朝廷并记录于史册的歌谣名称并非"白狼"而是"远夷",表明《白狼歌》并不是白狼夷独自创作,而是众多来自西南边疆地区的"远夷"共同创作的,反映了西南夷各族的共同

心声,体现了汉代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

具体参与《白狼歌》创作队伍的"西南夷",见诸史册者有白狼、槃木、唐菆等名。前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白狼歌》的记载,一方面介绍了归附东汉王朝的夷人有"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另一方面又言"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似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后汉书·明帝纪》叙述此事,则言"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4](P.121)。而《后汉书·种暠传》又有叙述种暠出任益州刺史期间"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诸国,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暠至,乃复举种向化"的记载。[5](P.1827) 可见唐菆并非人名,而是与白狼、槃木等西南夷各族并称的西南夷部族之一。"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之句中的"王"字应为书籍传抄中的衍字,其意为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首领率领族人共同慕化归附于东汉王朝,并于朝贡途中共同传唱《白狼歌》。

《白狼歌》共有三章,内容如下:

远夷乐德歌诗曰: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申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

远夷慕德歌诗曰: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圣德深恩,与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温时适,部人多有。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

远夷怀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狭。高山岐峻,缘崖磻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3](P.2856)

由上可知,《白狼歌》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称颂汉王朝膺获天命,如"大汉是治,与天合意"。(2)对汉王朝给予的关爱厚赐表示感恩,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圣德深恩,与人富厚","父子同赐,怀抱匹帛"。(3)叙述朝贡路途的艰辛,如"涉危历险,不远万里","高山岐峻,缘崖磻石"。(4)向汉王朝表达归顺效忠之意和美好祝愿,如"愿主长寿,子孙昌炽","去俗归德,心归慈母","传告种人,长愿臣仆"。可见,《白狼歌》的主要目的是向东汉统治者歌功颂德,表达夷人归附臣服的政治立场。从"百宿到洛""父子同赐"之语来看,也可以大致认定歌谣定稿于白狼夷等西南夷各族受到汉明帝接见、封赏之后。

作为具有政治目的的诗篇,特别是经过汉人官吏的翻译、润色,如果说《白狼歌》包含一定的美化、粉饰之词,乃在情理之中。不过从总体上看,《白狼诗》仍然具有足够的真实性意义,能够代表白狼夷等西南夷各族的真实政治立场与政治心理,前已有论。在这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歌谣中把归附东汉王朝之举比喻为"心归慈母",以"慈母"来比拟东汉王朝,表达了对东汉王朝的向往、热爱、信任、依恋之情,其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理性的政治选择,更饱含了强烈、充沛的感情成分。《白狼歌》所表达的情感与态度,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边疆地区的"百余国"共六百万余人口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这是统一多民族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的强大感召力与向心力的表现,也是西南夷地区民族融合和西南夷各族政治心理成长的表现。

如果把《白狼歌》放在两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略开发以及西南夷的政治心理演变等政治、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其内涵和意义可以得到更加丰富清晰的呈现。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以西、以南的西南各族被称为西南夷。根据《史记》的记述,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类众多,政治组织和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上呈分散状态。由于西南地区相对封闭性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汉代以前,西南夷各族与外界特别是与中原的交往互动非常少,以至于到汉武帝时期,夜郎、滇等在西南夷中实力影响较大的部族,对西汉王朝疆域大小一无所知,先后向汉使者了解"汉孰与我大"[6](P.2996)。谢维扬先生认为,先秦时期的西南夷各族没有具备"早期国家"的五个基本要素,即最高权力中心、政治机构、社会分层、固定地域和统治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他们仅仅处于酋邦阶段,尚未迈入国家化的门槛,即使其中政治组织最为发达的滇国和夜郎国,也仅仅是"一些部落的集合"或者"较发达的酋邦"[7](P.497-498),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复杂酋邦"[8]。

汉武帝在位时期,大力经略开发西南夷地区,通过遣使、封赏、疏通道路、撤除边关、设置郡县和武力震慑反汉势力等方式,在西南夷地区确立了统治。自汉武帝经略开发西南夷地区以后,西南

夷各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日益密切,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心理逐步萌芽壮大。邛、筰等西南夷首领主动归附西汉王朝,并积极配合西汉王朝在当地建立统治的各项措施,对西汉王朝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认同。史曰:"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6](P.3047)《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白狼歌》之事记录于"筰夷"条目之下,表明《白狼歌》的创作者即白狼、槃木、唐菆等夷人部落主要来自邛、筰之地,这与西汉时期邛、筰等君长主动归附西汉王朝的记载正好遥相呼应,说明白狼、槃木、唐菆等族主动归附东汉王朝是有地域传统和历史基础的,是西汉以来当地诸族认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延续。

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夷汉各族的交流互动日益密切。东汉王朝建立后,延续了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统治。虽然西南夷各族对两汉王朝统治者的态度反复无常,时服时叛,但是夷汉各族密切交融互动关系的不断发展是历史的主流。在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互动中,夷汉各族的相互了解也逐渐增多,西南夷各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也呈逐渐提升的趋势,东汉哀牢夷贤栗的事迹是一个典例。史载,哀牢夷居于西南边徼,汉代以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3](P.2849)。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其首领贤栗攻击附汉夷鹿茤失利后深感惶恐,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3](P.2849)四年后贤栗率部归附东汉王朝,光武帝封其为君长,自此哀牢夷"岁来朝贡"[3](P.2849)。贤栗的言行表现,与其说是"惶恐",不如说是对天意的敬畏和对东汉王朝的仰慕认同。自此哀牢夷结束了"未尝交通中国"的状况,逐渐融入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大家庭。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属,东汉王朝在其地设立永昌郡。[3](P.2849)

由此可见,《白狼歌》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以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民族融合与边疆开发为基础的。两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开发,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夷各族的国家化进程,使其从酋邦阶段一跃进入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促进了西南夷各族自身的政治成长特别是政治心理的成长,促成了部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白狼歌》的出现,是两汉王朝长期经略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结果,是汉代西南夷地区夷汉各族密切交融互动的典范,是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认同东汉王朝的产物,标志着西南夷地区夷汉各族的民族融合和西南夷各族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白狼歌》无疑是汉代西南夷地区民族融合和政治认同铭刻在史书中的文字"活化石",是历史的见证。

三、《白狼歌》与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

由于《白狼歌》在翻译、流传过程中得到东汉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吏的参与支持,并被正式呈送给东汉王朝官方,得到官方认可,因此《白狼歌》不仅反映了西南夷各族的政治心理状态,而且打上了东汉王朝官方思想的烙印,反映了东汉王朝最高统治者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白狼歌》作为一首源自边疆地区的夷语歌谣被译为汉文,进入朝堂,载入史册,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在西南边疆地区一次成功的政治文化实践,益州刺史朱辅、犍为郡掾田恭等地方官吏等《白狼歌》的推荐者和翻译者,以及汉明帝和《东汉观记》的撰写者,都是这次政治文化实践的重要参与者或支持者。

先秦至汉代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先秦儒家经典《公羊传》综合先秦诸子各个学派的思想主张,表达了通过实施仁政来实现政治"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汉代儒家学者对此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如西汉儒家学者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9](P.252)东汉经学家何休把"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夷夏"大一统"局面视为理想的政治追求。[10](P.38)"大一统"思想包含了丰富的疆域观念和民族思想,疆域的统一和边疆民族的归附,被视为实现"大一统"的重要标志,四夷则被视为盛世王朝的重要成员。"大一统"的理想境界是四夷来朝,天下一统,君王仁德惠泽四方。如汉武帝封禅于泰山的刻石文字中,有"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11](P.191)之语,表达了汉代统治者对四夷来朝、天下太平的"大一统"盛世的追求。在"大一统"政治理念影响下,汉代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吏普遍重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略,对四夷朝贡之事持高度重视、积极倡导支持的态度。

汉明帝君臣对待白狼夷等西南夷各族归附以

及对《白狼歌》的态度正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朱辅在益州刺史任上"宣示汉德,威怀远夷",十分重视对西南夷各族的怀柔招抚。他收集到《白狼歌》之后,郑重其事地请人翻译并派遣专人将归附的夷人首领及其歌谣文本"护送诣阙",直达皇帝,反映了朱辅对夷人归附之事的高度重视,这在朱辅呈送给汉明帝的上疏中有更加清晰的体现。在上疏中,朱辅引用《诗经》的诗句,将白狼夷等部族归附汉朝事件称为"彼徂者岐,有夷之化",与"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的儒家典故相提并论,表明朱辅将白狼等夷人归附之事视为一件旷世未有的盛事,堪与传说中的圣王时代媲美。

汉明帝对白狼夷等部族朝贡之事也是非常欣慰和赞赏的,史曰:

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4](P.121)

由上可知,明帝君臣将白狼、槃木、哀牢等西南夷各族及西域诸国远来朝贡之事与祥瑞现象联系在一起,视之为天意眷顾,昭示国运昌隆,天下一统,汉王朝仁德布于天下,乃为国之大事。因此百官朝贺,举国相庆,皇帝策告宗庙,赐爵于民,赦宥官吏,充分显示了白狼夷等西南边疆民族朝贡给明帝君臣带来的欢欣鼓舞、喜悦自豪之情,也正是这种情感和认识促使明帝下令将此事载入史册。史曰:"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3](P.2855) 明帝下令将《白狼歌》写入史书,目的是为了记录四夷来朝的"大一统"盛况,彰显汉王朝统治的繁荣强盛景象。白狼夷诸族归顺朝贡之事以及《白狼歌》受到明帝君臣的高度重视,与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密切相关。明帝君臣正是在"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推动下,高度重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略开发。汉明帝对白狼夷等归顺朝贡者的厚赐和隆重礼遇,是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在边疆民族事务中的生动反映。

白狼夷等部族的际遇在东汉时期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其他边疆民族受到朝廷厚赐、礼遇的事例不在少数。汉王朝往往为归顺者、朝贡者安排隆重的欢迎仪式,以示对来者的重视,同时也是为了展示王朝繁荣强盛,营造"大一统"政治气象。东汉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班固在《两都赋》中,热情讴歌光武帝、汉明帝的历史功绩,描述了哀牢夷等边疆民族前来朝贡的盛况。其文曰:"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詟水栗,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伶侏兜离,罔不具集。"[12](P.1364) 作为文学作品,《两都赋》难免有一定的文学渲染成分,但是它所叙述的情况有基本的史实依据,可与史书相互印证。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真切地体现了东汉君臣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认同,对边疆民族归附、朝贡的高度重视。《白狼歌》的翻译、流传及以夷汉"双语"载入史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心理基础上实现的。

四、《白狼歌》的历史价值

综上所述,《白狼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民族语言学价值,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由于《白狼歌》既有汉译文本,又保留了以汉语记音的"夷人本语",因而可以说是一份接近原汁原味的记录汉代各民族交融互动的历史档案资料,也是汉代民族交融、边疆经略开发和夷夏各族政治观念形成演变与交融互动的重要历史见证。两汉时期边疆民族归附中原王朝并远来朝贡的史实不绝于书,然而留下"夷语"歌谣且有汉译文本可供对照的事例却仅有《白狼歌》,因而显得尤为珍贵。

通过考察《白狼歌》的产生、流传过程,辨析《白狼歌》的汉译文本内容,并结合汉代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进行探讨,笔者认为《白狼歌》的汉译文本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不仅较为真实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而且体现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承载了丰富的汉代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对研究汉代西南夷各族的政治成长历程、西南边疆的经略

开发以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历程等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但是,对于《白狼歌》的历史评价也应保持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过于夸大其代表的地域范围和群体范围。严格地说《白狼歌》仅能代表汉代西南夷特别是居住于邛、筰之地的白狼、槃木、唐菆等族的政治情感与态度,并不能简单地普遍推及于同时期的其他边疆民族。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边疆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以及各民族的交融经历了复杂、漫长、迂回曲折的过程,甚至还出现过短暂时期内的历史倒退现象。从历史上中原王朝衰落或分裂时期边疆地区多次出现割据政权的现象,便可见一斑。当然更应看到,尽管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程十分复杂漫长,然而各民族交融互动、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最后,笔者通过对《白狼歌》的研究,认识到对民族语言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既要充分运用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民族语言田野调查方法,也要利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对民族语言文献资料的历史背景的挖掘,综合考虑历史时代特征,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史料形成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局面。惟其如此,才能让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充分发挥作用,促进民族语言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共同发展。

注释:

①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西夏研究》,1930 年第 1 期; 黄振华《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 3 期;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方国瑜文集》(第四辑)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刘尧汉、陈久金《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 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民族语文》,1982 年第 5 期; 郑张、尚芳《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民族语文》,1993 年第 1、2 期; 黄懿陆《东汉〈白狼歌〉是越人歌谣》,《广西民族研究》,2001 年第 3 期; 吴安其《〈白狼歌〉解读》,《民族语文》,2007 年第 6 期; 杨照辉《〈白狼歌〉辨析》,《民族文学研究》,1987 年第 1 期; (南朝宋) 范晔著,(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版。

②(汉)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参考文献:

[1] 吴安其.《白狼歌》解读[J]. 民族语文,2007(6) .

[2] 杨照辉.《白狼歌》辨析[J]. 民族文学研究,1987(1) .

[3](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 86) [Z]. (唐) 李贤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4](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明帝纪(卷 2) [Z]. (唐) 李贤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5](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种暠传(卷 56) [Z]. (唐) 李贤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6](汉) 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 116) [Z].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7]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8] 段渝,刘弘. 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J]. 苏州大学学报,2012(1) .

[9]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仁义法(卷 8) [Z]. 钟哲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2.

[10](汉) 何休注,(唐) 徐彦疏,刁小龙整理.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 1) [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汉) 班固. 汉书·武帝纪(卷 6) [Z].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12](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班固传(卷 40 下) [Z]. (唐) 李贤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收稿日期 2017 - 01 - 15 责任编辑 李克建